

钱理群：《1958—1976：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读邵燕祥：〈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找灵魂补遗〉、〈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铁蹦豆儿）

从地狱出来，

便不再有恐惧，

如摈绝了天堂，

也便永远不回去。

——要这一股

倔强劲。

——邵燕祥：《倔强》[1]

这篇文章从起意到动笔，大概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2003年萨斯横行的时候，我决心开始“1957年学”的研究，并于当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大的一次演讲里，公布了我的“研究的初步设想”，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另一种迫害与受伤》，准备“以杜高等三位右派档案为个案，讨论所谓‘右派改造’（知识分子改造）的内在理念、机制与实质”。[2]这里所说的“三位右派”除了剧作家杜高，自然科学家束星北之外，就有诗人邵燕祥。当时杜、束二位的档案都已整理出版，邵燕祥也出版了《沉船》与《人生败笔》，我对这些原始史料背后的人的精神的原初状态，

极有兴趣，试图由此而进入当年右派的内心世界，分析他们的思维、观念，情感、心理与语言，并探讨知识分子“改造”的秘密。但我又自知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因此迟迟不能动笔。到了 2007 年，为了将《拒绝遗忘：“1957 年学”研究笔记》一书，赶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时出版，我只得在该书《后记》里宣布，将这一部分写作计划暂时搁置，“留待以后弥补”。但我又因此对自己的研究在“内容与结构上的不完整”深感不安，对几位研究对象，以及他们代表的右派朋友，更有一种负疚之感。这就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大概在 2010 年，我曾经试图偿还文债，对邵燕祥的几本书认真作了笔记，但总觉得找不到切入口，只得又搁置下来。直到 2014 年，我终于下决心重启“三大右派档案研究”，并将其纳入我的“1949 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框架、结构之内，先后写出了《杜高档案研究》与《束星北档案研究》二文。现在（2015 年 5 月）着手的，就是邵燕祥的私人卷宗研究。

就在我的研究起起落落的时候，邵燕祥自己也没有停止对那一段生命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他在 1981 年整理、1996 年出版《沉船》，1996 年整理、1997 年出版《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以后，又于 2004 年 5 月出版了《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 年 8 月出版《〈找灵魂〉补遗》，2014 年出版《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也可以说 30 年如一日（1981—2014）地在铭记那三十年（1945—1976）的个人生命史，并自觉地将之视为“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3]自认为是一块“当代的化石”，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

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4]目的是“为了拒绝遗忘，抢救记忆，给那一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岁月留下一些细节，脚注，也是在场者的证词”。[5]而正如论者所说，这样的“反思历史，审视历史”的背后，更有“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的自觉，“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而“在文革结束后‘归来’的一代作家当中，邵燕祥恐怕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对刚刚过去的个人史，自觉地采取认真严肃彻底的反思态度者之一”。正是这样的“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的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和反思精神”，“清醒严峻的理性”思考，构成了邵燕祥的个人档案和记忆的特殊价值与魅力。[6]

我这次重读，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与精神的魅力，邵燕祥自己对历史与自我的解剖和理性思考，构成了我的研究论述的基础。我同时又产生了同代人的亲切感与强烈共鸣：我诞生于 1939 年，比 1933 年出生的邵燕祥小了六岁，但也勉强属于“30 后”这一代人。因此，邵燕祥书中提到的那个年代（主要是建国以后）他喜欢的作家，读的书，唱的歌，看的电影、戏剧……都能唤起我的许多记忆；他所遭遇的思想困境与改造尴尬，我更是深有体会。我还发现自己一直都是邵燕祥的忠实读者，他写于 1951 年、1954 年获奖的作品儿童诗《毛主席开的甜水井》，是当时正在读高中的我最喜欢朗读的，他表达的是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为豪，饮水不忘掘井人，因此对“伟大领袖”充满崇敬之意的我们这些共和国年轻一代的心意的。

有意思的是，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邵燕祥正式提出入党申请；刚刚满 14 岁的我，也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入团申请：我们都是决心献身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限憧憬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因此，邵燕祥随后写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颂歌，如《中国的道路呼唤汽车》、《我们架设了这条高压送电线》，都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的：那个时代大家都有一个“到远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情结。但后来我所喜欢的这位诗人，落入右派的罗网，我知道后似乎并无强烈反应，大概是我自己正自顾不暇：因为对反右运动的“负面影响”提出担忧，我受到了“限期改正”的团内处分，大学毕业后就以“中右”的身份，发配到了贵州。

但在那里，我却意外地读到了邵燕祥 1962 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散文《小闹闹》，我是由衷地为他的复出感到高兴的；但很快（1963 年初）又在《文学评论》上读到了唐弢的批判文章，也由此而预感到大风暴之将至：这样的政治敏感，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以后“反修话剧”《叶尔绍夫兄弟》在北京和各大城市演出的消息，也传到我所在的小城，自然无缘观看；后来读邵燕祥的回忆文章，才得知他是始作俑者，自有一种欣喜之感。或许就是这样的影影绰绰的缘分，使我这回试图研究邵燕祥的人生之路、心灵之路时，也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了进去，成了主体投入式的研究。我的主体投入的另一面，就是难以摆脱的现实感，我在读邵燕祥的历史档案时，总是感到当年支配我们，造成精神困惑、迷误的许多逻辑正在重新被强调，并强行灌输；我们已经有了反省的历史歧路，似乎在重现，并吸引着和当年的我们同样天真、善良的人们，这都引发了我内心的

焦虑与不安。这样，不仅我眼里的邵燕祥的个人档案，连我的对之进行研究的文字，都成了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也不知这是特点，还是缺憾，就这么写出来吧。

以上算是一个“开场白”，下面就进入正文。(未完，待续)

註

[1]诗作于1948年，原载1948年5月5日《经世日报》副刊。时邵燕祥只有15岁。此诗收《找灵魂——邵燕私人卷宗：1945—1976》，第55页。

[2]钱理群：《我的“1957年学”研究》，收《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494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3]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收《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4]邵燕祥：《为什么编这本书？——〈人生败笔〉序》，收《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第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5]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收《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1页。

[6]王培元：《序言》，收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第2页，3页，4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

## **(一)“我死在1958”**

还要声明一句：本文的题目《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就是从我的研究对象那里借用来的：邵燕祥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的《自序》里提到他本是准备以“死者与生者”为书名的，意在提醒读者与研究者注意：他所回忆、叙述的个人历史时段，即 1958—1962 年前后，“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由此引发的是一个反省：“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作出自己的判断”。[1]在我看来，这也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提醒：我们在讨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心境与命运时，不可忘记同时代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底层居民”的处境、心境与命运，那是真正构成了“时代之底色”的。

当然，我们讨论的重心，还在知识分子的“死与生”。因此，就要从邵燕祥刻骨铭心的“我死在 1958”说起。

的确，当 1958 年 2 月的那一天，在宣布行政降职处分以后，党支部大会一致举手通过“开除党籍”的判决之时，就已经宣布了邵燕祥政治上的死刑。就

在那一瞬间，邵燕祥“从自诩革命者的左派成为以党组织名义认定的右派”。[2]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从此被剥夺，这是“比丧失肉体生命更痛苦”的“终身惩罚”，对邵燕祥这样的追随革命的青年来说，“一个没有了政治生命的行尸走肉是可鄙的，可耻的，不可想象的”；[3]这同时也意味着，邵燕祥从此被排斥于“人民”之外，成为共和国的“敌人”，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程序，他就因为党的一纸判决，成了国家机器专政的对象。这样的由党的意志，随意决定一个国民（当时根本没有“公民”的概念）的生死命运，应该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体制的特色吧。

或许更具中国特色的，是在宣判死刑以后，还要求你服罪，承认自己“罪该万死”，对你的宣判是正确的，英明的，甚至是自己所希望的，自愿接受的。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的折磨和死亡。于是，邵燕祥就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

“昨天我还不是‘我们’之中的一员吗？今天我却是‘我们’施以不杀之恩的囚徒，是吗？也许我从来不属于‘我们’，而像我所称为同志的人们竭力论证的，我只不过是混入‘我们’队伍的异己者？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又如此执拗地自认为党的儿女呢？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谬托知己？是自命不凡的误会？是不知羞耻的攀附啊！……”“我在入党以前就拳拳服膺着‘事无不可对党言’的格言，我甚至认为在党的面前只有进行自我批评的义务，而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相信党经过严肃郑重的审查，能够清除自己队伍里的敌对分子，而没有想到这个敌对分子就是我……”[4]

今天的年轻读者恐怕已经很难理解邵燕祥这样的困惑与纠结；但我们那一代

人，却有着感同身受。因为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每一个政治运动中，一旦成为革命对象，就要面对这样的“考验”。记得在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我所在的学校党组织宣布为“反动学术权威”(仅因为我是北大毕业生)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仅因为对党支部提过意见)，隔离审查、批斗之外，还要求彻底检查认罪。我自己也陷入极度困惑之中：我要为突然强加的罪名找到一个合理的，自己能够接受的解释。我当然不可能对党领导的这场革命本身有任何怀疑，就只能和当年的邵燕祥一样，在自己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5]

而且我们还真的“站在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自己做思想说服工作”，检讨书写起来还似乎“顺理成章，没有疙瘩”[6]。也就是说，我们半是被迫、半是自觉地接受了党对自己的死亡判决。记得在八十年代，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判决的材料，最后布哈林等都在法庭上表示真诚的忏悔，承认自己有罪，而接受死刑。许多人都对此感到不解，而我们这些过来人却是懂得的。

我们懂得其中“党的逻辑”的力量。如邵燕祥所说，“这样的逻辑曾经统治了漫长的岁月，就连思辨清晰的逻辑学教授，机锋透辟的辩护律师在它面前也终于哑口无言，轧的粉碎”。对我们这些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却是有说服力的”。邵燕祥说：“说服力就在它发表在反右派斗争后的刊物上，当然是左派的、党的刊物上，当然代表党的观点，而我是听党的话的，我也一定要以这样的逻辑以至这样的口吻来批判自己的那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灵魂，让它服罪”。[7]

这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其说服人、迷惑人的奥秘在哪里？



那么，我们就来读一读邵燕祥从 1958 年 1 月 7 日到 2 月 25 日写的读书札记。邵燕祥说：“这里如实地记录着我执著的坚信，也记录着困惑与迷惘，我的虔诚夹杂着我的过失。”[8]于是，我们发现，最具“说服力”的，是几个大的思路与逻辑。

其一，要从“大处着眼”：“应该学习这样看问题，从六万万人民出发看问题，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看问题”。首先引出的是“人民的利益”，“大多数人（‘六万万’）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概念，并且赋予“高于一切”的神圣意义，一下子就把你盖住了，压住了。这背后又隐含着——一个逻辑：在这样的宏大的，因而也是抽象的“人民”、“大多数”、“国家”概念笼罩下，“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同时隐含着的是一个道德原则，这也是这一代人熟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一个人仅为自己的家庭，那是卑鄙；一个人仅为自己，则是无耻”，逻辑结论就是为人民、大多数、国家利益而牺牲是伟大、光荣的。这样的逻辑转换，就一下子把你弄迷惑了，落入了更大的逻辑陷阱：“哪怕我在 24 岁死去，这只是一个个别的人的命运，决不会影响到全国一亿二千万青年仍有他的远大前程，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仍然能够驰骋他们的才思。我和我的同案犯不仅在 6 亿人口中是少数，而且是个别的。也许正是因为把像我这样的人排出革命队伍，我们的事业会更加兴旺发达”。

得出了这样的逻辑结论以后，在批斗中所受到的伤害，一切委屈，都无足轻重了。而且还振振有词地有了一套“理论”。如“必要论”：“反右中的‘打击’和‘挫折’是必要的——从国家、社会来说，不经过这一次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在许多界泛

滥起来，建不成社会主义；从各个人来说，如不经过这一斗争，所抱的思想、立场、观点不会放弃，不会认错。现在经过群众斗争，才有改造的可能”。还有“代价论”：“斗争面宽了一点，伤了点感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说是一种代价。既要肃反，就不能不付出一些代价。如果不肃反，让反革命猖狂活动，我们将要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呢？”还有“辩证地看”：“受到这一挫折有好的一面，打击的是你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观点、方法。不破不立”。这样绕来绕去，最后就变成“心悦诚服”地认定：“我的政治生命被判死刑也许是值得庆贺的，是我目前所唯一能作的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贡献”。最后还是归结到那个大概念，大前提：为“党”、“人民”、“大多数人”、“国家”的利益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政治生命、权利和利益，承受各种伤害，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是光荣的，值得庆贺的。[9]

其二，“远大目标”。据说这是刘少奇的一个教导：“如果他们认识了并且足够地尊重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心一意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自觉地改变自己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那些思想、传统和习惯，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真正自由的、愉快的公民”。就像邵燕祥所说，这里“神采奕奕地指出的，成为社会主义真正自由的，愉快的公民的前景”，对包括邵燕祥，还有我在内的那一代人，是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的。同时宣布，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也是一个大词，对我们这一代更有一种吸引力与威慑力：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服膺于“真理”；有违这样的“客观规律”，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承认并确认了这样的大原则，

大前提，就自然引出两个逻辑结论：人必须无条件地“贡献于新社会”；“不但要看人过去做了什么，还要看他将来能做什么”，为了“将来”的理想，人可以而且应该放弃现在的一切个人利益；特别是要“抛弃自己那些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与习惯，抛弃自己的错误”。而只要承认、确认这两点，最后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只要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愉快的公民，让我承认犯了滔天大罪又有什么不行呢？罪人不是也可以改造吗？”这里的逻辑是：为了“将来”的自由，就得牺牲“今天”的自由；为了“将来”的愉快，就得承受“今天”的不愉快。[10]

其三，应时时考虑“敌人”的存在。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接受的教育：社会主义中国处在国内外敌人包围中，不仅国内的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一个“右”）时时蠢蠢欲动，而且国际上的帝、修、反也是“亡我之心不死”。问题是这样的敌情观念对我们的思维、情感、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即所谓“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于是就自然引申出这样的反省和自我警：“我如果对党的批评和处分采取错误的态度，也是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欢迎的。凡是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派所欢迎的事情，便不要做”。[11]这就是说，即使自己已经被党宣判为“敌人”，还是要与心目中的“敌人”划清界限，而且为了不让被“敌人”利用，就要心甘情愿地接受党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和惩罚，并借此证明自己绝非“敌人”：这其间处境的尴尬和逻辑的混乱，恐怕也是今人所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其四，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思考与对待自己的问题。这才是要害所在。前面

谈到的“国家”、“大多数”、“人民”、“远大理想”以及“客观规律”，都是抽象的大概念，它最终落实到哪里？这也是邵燕祥反复追问自己的：“人民在哪里？”[12]大多数人哪里？国家在哪里？未来在哪里？答案就只有一个：党才是人民、大多数人、国家、未来的“代表”，因为党领导的革命解放了我们，“幸亏我们有党，有祖国，有人民，我们才不会只剩下耻辱”，[13]“党代表未来。党代表一个经历着临盆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党代表一个光明无暇的新世界”。[14]如果说我们这里讨论的“党的逻辑”是一篇大文章，最后的归结就是“党”，这里存在着一个“党—人民—大多数—国家—未来—客观规律—真理一体化”的逻辑结构，党就是一切：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掌握着客观规律和真理；党带领我们走向理想的未来。正是这样的党的铁的逻辑，使邵燕祥们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曾经也许是不自量地狂妄地自命为人民的歌者，我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今天，比我更有权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代表者，宣布我是反人民的，不是以个别党员而是以党组织的名义”。[15]出路只有一个：“向党投降，向人民投降”，[16]“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服帖帖服从党的领导”，而且这是唯一的“生路”。[17]

这就是党要求的“彻底转变立场”，即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来思考、对待一切。首先是“正确理解”党对自己的惩罚。对刚刚被打成右#派的邵燕祥来说，就要解决三大思想问题。一是理解党对自己这类右#派的“孤立政策”，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说服：“孤立右#派’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样做，限制了、消除了右#派的影响，

从而巩固了党对中间派的领导”，“对右#派本身，造成不好受的局面，势必彻底改造不可，否则往后日子难过”。其二，如何获得党的信任？这首先是因为“自己不重视党的这种信任，亲手破坏了这种信任，怎么能取信于党？党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人”。但希望还是有的：“经过一个长时期，改造确实有效，仍然可以得到人民的批准，党的批准”。其三，“正确对待党的批评或处分，这是加强每个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给予批评或处分，在党来说，是表明为郑重的党，严肃党纪，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对受批评、处分的人来说，理所应得，是一种惩前毖后的必要的举措。只有虚心接受、诚恳改正的义务，没有耿耿于怀、拒绝改正的权利”。[18]处处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自我说服，仿佛也真的振振有词了。

尤可注意的是，此时的邵燕祥尽管已经被党开除，却依然坚持自己的党的“组织纪律修养”。这其实也是党所要求的。邵燕祥详细地记录了一位主管反#右#派斗争的副局长的讲话：“要靠自我思想斗争，来达到改造的目的”，“思想中有毒，要刮骨疗毒。要有股狠劲”。[19]邵燕祥也果真这样做了；1981年他在回顾当年的思想改造时，对他的儿女说：“你们不理解一个幼稚而真诚的革命者渴求改造、渴求修养得完善而表现出来的狂热的自我批评”。[20]这真是狂热地追求革命的一代人，在被革命抛弃以后，依然按照革命的要求，狂热地否定、改造自己。而改造的中心是“以适应集体的、阶级的、组织的纪律要求，力求完成个性到党性的转变”。[21]这就需要谈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这一代人的影响。

邵燕祥说，这是“对我影响最大，使我感觉最亲切的”一本书，它让我懂得“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应该光明磊落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诸求己”，“在修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痛苦里面，也将会有被同志们误解的可能。在遇到这种非常情况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毫无委屈之心”。现在邵燕祥“面临着党对我的特殊形式的考验”，该“怎样做到刘少奇同志所要求的，‘……而毫无怨恨之心’？”[22]可以看出，刘少奇的《修养》所起到的正是精神慰藉剂的作用，把不公正的处分，政治上的迫害，轻轻化解为“误解”，并在“毫无委屈、怨恨之心”与“光明磊落地承认自己的缺点”的“修养”里获得道德崇高感。本来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残自辱，现在竟然也蒙上了神圣的光圈。

这样的“修养”，其实是勉为其难的。其中许多自我说服的逻辑，可以说是匪夷所思。比如，“唯其不自觉有时就更说明中产阶级之毒的深重”，“革命意志薄弱往往正说明反革命意志顽强”，“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往往正是坚定的反党分子”，等等。邵燕祥说，“这就是‘逻辑’的力量”。[23]在我看来，这正是“党的逻辑”的令人恐惧之处：这是名副其实的“精神外科手术”。[24]

这里也不妨谈谈我自己的经验。如前文所说，在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党判决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我经过自我反省，接受这一政治死刑的依据，也是“革命逻辑”。我在八十年代总结历史经验时，有如下分析与概括：先是对知识分子确实存在的弱点的夸大——具有反省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夸大，纷纷自觉地谴责自己。然后打出了“兴无（产阶

级思想) 灭资( 产阶级思想), 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旗号——对西方与苏联在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封锁极端反感, 被激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 也很容易地从“保卫中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独立性”的角度接受了这一口号。第三步, 就在“兴无灭资, 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旗号下, 把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现代意识(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 统统划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范围, 而予以根本否定与彻底践踏。这样的逻辑推演的最后, 就发展到“书读得越多越蠢”, 知识本身变成了罪恶。结论是: “这是一个可怕的逻辑的迷宫: 不但前提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而且每一步推理, 都有可以被接受的理由, 似乎合乎逻辑。喜欢作抽象推理、逻辑游戏的知识分子,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 不知不觉地, 自己出卖了自己, 终于相信自己有罪, 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根本改造, 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种渗入这一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25]

问题的严重性, 更在于当我们试图追问这样的精神迷误与死亡是怎样发生的时候, 就触及到我们最初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所暗含的危机。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未完, 待续 )

註

[1]邵燕祥:《自序》,《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第5—6页。

[2]邵燕祥:《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224页。

[3]邵燕祥:《我死在1958》,《沉船》,第2页。

[4]邵燕祥：《我死在 1958》，《沉船》，第 6—7 页。

[5]参看钱理群：《后记》，《心灵的探寻》，第 352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出版。

[6]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27 页。

[7]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45—46 页，第 42 页。

[8]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31 页。

[9]以上讨论见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32 页，第 36 页，第 38 页，第 37 页。

[10]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34 页，第 35 页。

[11]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33 页。

[12]邵燕祥：《人怎样变成垃圾》，《沉船》，第 190 页。

[13]邵燕祥：《罪与罚》，《沉船》，第 56 页。

[14]邵燕祥：《人怎样变成垃圾》，《沉船》，第 144 页。

[15]邵燕祥：《人怎样办成垃圾》，《沉船》，第 190 页。

[16]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30 页。

[17]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29 页。

[18]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27 页，第 28 页，第 31 页。

[19]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37 页，第 39 页。

[20]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28 页。



[21]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3页。

[22]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23页。

[23]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45页。

[24]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21页。

[25]钱理群：《后记》，《心灵的探寻》，第354——355页。

## （二）精神迷误与死亡的伏线是怎样埋下的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端。1947年，邵燕祥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由此走上了革命之路。问题是，邵燕祥是怎样理解革命的？于是，我们在他这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第一次读到了“我们”与“你们”的对立：“我们在伟大的号召下走上了战场，你们碰杯而又握手，碰碎我们底生命，握紧我们底自由。”[1]这里说的“我们”应该是一年之前写的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屈辱者，被宰割者”，[2]是和“他们”（权势者）天然对立的。在此之前，邵燕祥生活与视野里只有“我”，一个“渺小而渺小的弱者”，总是觉得自己“成了生活的囚犯”，发出“我真贫乏，我真寂寞，只有蓝天笼罩着我精神的烦燥”的哀叹，只得“骑了幻想的瘦马踽踽而行”。[3]现在，这位年仅15岁的堂吉诃德在“我们”这里找到了归宿：“我们是褴褛的一群，我们是饥饿的一群”，“我们是黑压压的一片，我们要淹死你们”，“痛苦是我们的，愤怒是我们的，还有被加予死刑时所应有的仇

恨！这一切使我们坚定地进军，我们要粮食和土地，我们要活命！[4]这就是邵燕祥想象中的革命者：是被压迫者（“褴褛”而“饥饿”），有强烈的革命诉求（“要粮食和土地”，“要活命”），是战斗的群体（“我们”），是大多数（“黑压压的一群”）。这就是邵燕祥理解的革命：既有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更有后来邵燕祥自我反省中所说的“旧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那样一种盲目拼死的自发的反抗，狂热的复仇主义的暴力欲望（“淹死你们”），以及集“痛苦”、“愤怒”、“仇恨”、“坚定”于一身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质。邵燕祥特意指出，“这种情绪化和绝对化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似乎也为我后来接受极‘左’的东西埋下了伏线”。[5]

而 1948 年的邵燕祥，作为革命的新兵，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与“我们”的关系。于是，就有了题为《蜕》的这首诗：这是生命的蜕变，‘或者把旧的自己毁灭，或者死去，我憎恨，我忏悔，我希冀……’；终于，“我”融入了“我们”之中，“我重新获得了宝贵的生命”。而“我们”向“我”发出的第一个号令，就是“或者和我们同行，或者死！”[6]这也可以说是革命给邵燕祥的启蒙教育：革命就是绝对的二元对立：不是“我们”就是“他们”；不是“同志”就是“敌人”：非白即黑，非是即非，非革命即反革命。革命就是“一个吃掉一个”，不是“我活”就是“你死”。革命就是不断地站队：“或者和我们同行，或者死！”这大概是邵燕祥万万没有想到的：这几乎就是对自己命运的预言。1947 邵燕祥参加了革命，自然是“和我们同行”；但到了 1958 年，“我们”（革命）突然宣布，邵燕祥不是同行者（请注意：不是邵燕祥不愿意与“我们”同行，而是“我们”把他除名了），于是，他就只有“死”了。这么说来，邵燕祥之“死”

早在他宣布和“我们”(革命)同行时，就已经埋下伏线了。

当然，这是十五、六岁的革命堂吉诃德所不能预计的。他当时感受到的，只是融入“我们(革命)”成为“多数”后获得的巨大力量、喜悦和信心：“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起来；千万人起来，敌人就战栗地倒了下去……”“这已经不是预言，这是不可违背的真理，生者和死者都已经看见：我们是多数！千万个爱人，千万只剑，而敌人只是一个啊”。[7]“我底歌也是千万人底歌，我底心也是千万人底心”。[8]这位血气方刚的中学生甚至径直以“我们是多数”的豪情，自动“代表”中国人民发言了：1949年，当一些对新中国怀有成见的美国记者对北平工人与学生欢迎解放军进城游行多有嘲讽时，邵燕祥立即在一张私营报纸上发表《警告美帝新闻记者》一文，理直气壮地表示：“北平人民——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北平人民——中国人民是不可屈辱的”。[9]直到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邵燕祥才意识到他当年这样以“人民——多数”的“代表”自居，也是一种僭越：因为在革命的中国，“代表”只能是党。这样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代表”感，是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祸根的。[10]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有详尽讨论。但应该客观的说，在革命刚刚胜利，新中国初建时期，知识分子孤独的个体突然融入革命和国家群体里，所产生的充实感，自豪感，以至主人翁感（自以为可以代表国家和人民），是一种普遍的情绪，而且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沉湎于浪漫主义革命想象中的诗人，还要再往前跨一步。1949年7月，邵燕祥写了《歌唱，红色歌手们》一文，这本是为纪念聂耳逝世而作，但他却借

此向“年轻的战士，红色歌手”(当然包括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新的标准：“当你们不再属于你们，你们就不再是你们”；“你们把生命注入声音”；“你们的声音，是千万人的声音”；“你们是知道自己是没有声音的，只因为歌唱人民才感到光荣”，“人民是大海沸腾，你们不过是贝壳，你们的声音是海的回声”；“人民要你们歌唱什么，你们就歌唱什么”；“最好的歌，歌唱人民的祖国；最好的歌，歌唱祖国的人民”；“你们要唱遍新的中国，最好最好的毛泽东之歌，劳动的少男少女之歌！”[11]

这是“我”和“我们”关系上的一个突进：不仅“我”要融入“我们”，而且要彻底地消解。这就是毛泽东要求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化”。于是，就没有了“个人”的声音，只有“千万人的声音”；个体是“没有声音”的，至多只是群体的“回声”。于是，诗人不再具有任何独立性，只能“人民要你们歌唱什么，你们就歌唱什么”。歌唱祖国，人民，党和领袖毛泽东，就成了“红色歌手”唯一的使命，唯一的题材与主题。

邵燕祥在建国后发生这样的思想突进，大概也非偶然。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充斥我头脑里的都是社会政治、对敌斗争，涉及集体、组织、国家民族，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涉及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兹事体大，几乎没有萌生其他诗思诗情的余裕；即使偶有兴会，又可能由于自律，认为这不是革命者所应有而排除了”。[12]整个脑子被祖国、人民、社会主义这些“大词”所盘踞，就容不下任何“个人”的东西了。他还专门撰文批评一些“小资产阶级诗人”，“他们没有体验过大的群众斗争的紧张和欢喜，个人感情常常成为了一种太大的负担”，因此召唤诗人们“自己走进群众的队伍，然后被批准成为队伍的一员”。[13]这样的消解

个人的“我们”观，后来就发展为一种自觉的文艺观、政治观和信念：诗人（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诗人应当是人民最关心的希望、思想、感情的表现者，应当是党的思想的表现者”；“认识、理解、复述对党和人民最重要、最需要、最主要的东西”应该是诗人的根本任务、生活目标与价值所在。

[14]邵燕祥和他同类知识分子这样自命为社会、时代、人民、国家的“代表”，其实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我们”（人民，国家，党）承认、批准你的“代表资格”吗？他们更万万没有想到，如此急切地要求充当代表，在党看来，这无疑是向自己的天生的代表和领导地位挑战。到了反右运动，发生前文所提到的，自认为“人民的歌手”的邵燕祥被“更有权宣布自己为人民愿望和利益的代表”的党，开除出人民队伍的悲喜剧的发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5]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交给“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自己的文学事业，都与“我们”联接在一起，完全放弃了个人独立性，实际上就有意无意地在“我”与“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依附关系。一旦被“我们”抛弃，被视为“垃圾”，除了按照党的安排自愿“死亡”就别无他路了。

这里的关键，就在“党”的意志：在中国革命和国家的体制里，党才是“我们”（国家，人民，大多数）的真正代表。回到历史的起点上，就可以发现，十五六岁的邵燕祥，在发现“我们”（被压迫的人民，大多数）的力量、价值时，就发现了“党”，可以说，这是同一个过程。他回忆说，“从一位国文老师那里借到毛泽东的《论联

合政府》一书。书里提出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深深地吸引了我”。[16]因此，在建国前夕，邵燕祥对“从原野那头走来的队伍”，“献上遥远的敬礼”，欢呼“高举着摇荡的火把……我们的队伍像一支红色的川流，燃烧着闪笑着奔泻而来”时，[17]在他心目中，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我们的队伍”，是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也是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解放者，他对之高唱赞歌，并希望融入其中，是由衷的。用邵燕祥自己的话说，当他歌颂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时，“并没有功利意图，而是发自内心，发乎自然”。[18]今天来看，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但邵燕祥同时又反省说：自己“长时期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后来参与大规模的个人崇拜宣传之始”。[19]如前文所说，邵燕祥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处理和人民、国家关系时，有一个由合理的发现与认同，到发展为人民、国家崇拜，从而走向精神的迷误的过程；那么，在对党和毛泽东的认识与关系中，也同样发生了由理性的选择，到非理性的党崇拜、领袖崇拜的历史的失误。而这样的失误是发生在建国以后的。这是因为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新中国”；新中国统治下的每一个公民和党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邵燕祥这样的知识分子、诗人，党不再只是一个精神上的资源，而是现实的具体的领导，用邵燕祥自己的话来说：“我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组织上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最忠诚的儿女们联系在一起”，党不只是“我的至亲”、“我的师长”、“我的领路人”，更是我必须服从的领导、指挥者与监督者。[20]应该说，

邵燕祥并不是立刻就适应这样的变化的。他回忆说，本来自己的诗文，“都是我想写的，我怎么想就怎么写，是我心灵的感受，是我对生活的认知”，现在却要“奉命写作”，有些作品就写不出、写了也发不出来了，“因为内容不符合一定的规范，具体细微之处更经不起繁琐的‘宣传口径’的挑剔”。由此而产生了如何“努力适应‘新的要求’，才能逐渐重获发表权的隐衷”。[21]邵燕祥这样描述自己“作为新参加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在建国初期的心态：“面临着从未经过的社会大变动，和从解放区带来的一套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方式，既新奇，又兴奋，深恐自己跟不上。日常业务工作并不紧张，紧张的是学习及批评和自我批评”。而生活检讨会的中心，就是要批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22]

批判的目的，是要让邵燕祥这样的追求革命的青年，重新认识“革命”。如前文所说，邵燕祥最初对革命的体认，是夹杂着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想象的；而现在要批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要结束这样的思想混乱，建立新的革命观：革命是一个由革命政党领导的，有统一的目标，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纪律，统一步伐的高度自觉的政治行为。它绝不允许“过高地估计个人的作用”，把个人置于党之上；绝不允许任何自发的行为，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组织安排，遵守党的纪律。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以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绝对服从革命利益、党的利益，并且要自觉地与违反党的利益的思想、行为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为维护党而不惜牺牲，自愿地为党的事业“献身”。[23]这样的绝对要求，是早已服膺于党的邵燕祥们所能够、愿意接受的；因

此，就有了邵燕祥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给党支部的信》里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自由主义”、“组织观念薄弱”的痛心检讨，以及“我准备着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准备着在钢铁纪律的队伍里做一名新兵”的誓言。[24]还有在入党后写的第一首诗里的衷心表白：“党，我要永远听你的话”；“在未来的全部年月里，做你要做的一切事情”。[25]但他要再进一步向党表示忠心时，却又露出了让党不放心的“尾巴”：“党，你是岩石，耸立在险恶的海里，我和弟兄们的骨肉，是你的根基”；“党，你是太阳，我是星，我发热，我发光，是由于你的力量”。[26]一位老党员立即指出：这是“没有摆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你有什么资格自命为党的“根基”？在党的阳光照耀之外，你还要发什么热，什么光？而且这位老党员还是在“暗中偷开我的抽屉”时发现了这首诗，抓住了罪证的，邵燕祥为此“感受到了伤害，一片光明的感觉中掠过最初的阴影”。[27]其实，他不懂得，这正是这位老党员的党性表现之所在：为了党的利益，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邵燕祥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党性的修炼。但不管怎样，邵燕祥终于炼成了“以党的利益为利益，以党的是非为是非”，处处听从党的指挥的“驯服工具”了，这应该从此如鱼得水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又落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有一天，党突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根据自己的是非观念，把他和同类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宣布了政治上的死刑。这时候，再要坚持“以党的利益为利益，以党的是非为是非”的党性原则，就只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要高呼“皇恩浩荡”：这倒恰恰道出了“驯服工具论”的本质。

问题在于，这样的愚忠是有某种信念支撑的；这就是邵燕祥在写给党支部的



信里所说：“从来没有一个个人、一个集体能像共产党一样，使全人类得到解放、幸福。我们最远的后代，将要想到人类的历史是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开辟了新页的，而我们曾经和他们共同呼吸，在他们的旗帜下，在毛主席的亲身教育下，做过一点工作。我们的后代将会认为我们的工作光荣的，伟大的。为了这个，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幸福，我愿意像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准备着接受作为共产党员所必须经受的种种患难和风波”。[28]不管今人对此做出如何评价，我们都必须承认，邵燕祥们在表达这样的信念时是绝对真诚，发自内心的，而绝非刻意的表态与表演。邵燕祥曾自称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左倾少年”，[29]其最大特点，就是有一种“完美主义的理想憧憬”，要求“纯粹、彻底”，容易陷入“绝对化的狂热性”。[30]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与向往，显然带有浓厚的乌托邦主义的色彩。在 1953 年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邵燕祥多次到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新建工程采访，身临其境，于是就“以审美的眼光表现劳动，表现劳动者青春的生命力、主动性和敬业精神”，写下了后来结集为《到远方去》的成组的诗，[31]不仅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诗人，更使他产生了“在地上建立天堂”的信念和幻觉。他不仅发出“条条大路通向社会主义，我们浩浩荡荡走向天安门广场”，[32]“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不靠上一代，不靠下一代，就靠我们这一代”[33]的时代最强音，而且时时把思绪伸向更辽阔的空间与时间。他写《地球对着火星说》：“你可望见我望你的眼睛？说是近，却还是这样遥远，未来的岁月又是这样无穷”。[34]他“思索着亿万年的岁月流转，亿万人的长远的幸福”，企望着“让太阳

更强烈的照耀，让天更青，让草更绿，让爱情更炽烈”。[35]尤其引人注目的，他把这一切都和党联系在一起，他说党给了自己“一颗永远不宁静的心。我不是休止符，我们是伟大生活的主人”，[36]“一声号令，千万声回响——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37]“只要我们高举着党的唯一的大旗”，一切目的都可以达到。[38]不难看出，邵燕祥和同类知识分子是把自己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都寄托在党的身上的，如他自己所说：“党是我自己选择的，选择了党，也就是选定了我一生的理想、道路、事业，这是不可更改的”[39]。因此，对于这一代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联系，是难以割舍的。就邵燕祥而言，即使到了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他对这一切都已经有了反省和反思，认识到自己的“天真、幼稚、轻信和形而上的错误”，甚至认识到自己的理想、信仰的乌托邦性质，但他仍然坚信，在这些失误的背后，还有着不能轻易舍弃的东西，即“高于个人荣辱与毁誉的执著追求”。因此，他依然坚持：“尽管漫长的岁月磨钝了我们的痛苦，我们还关切着党的存亡，人民的痛痒；尽管伪善的说教长久地要我们悔改为明哲保身的市侩和奴才，到头来我们依然是党和人民不知悔改的儿子：保持着革命的初衷，信守着入党的誓言”。[40]这样的情怀大概是很难为后人所理解的；而且邵燕祥自己在1993年重读写于1981年的这些文字时，也谈到了其中的“局限”。[41]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们感兴趣的还有邵燕祥们选择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时，他们非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的目的，而且是作好了付出种种代价的准备的。邵燕祥回忆说，“我们那

一代人，大概不少人是默诵着（屠格涅夫的）《门槛》中斩钉截铁的回答，跨进革命这一‘门槛’的。我也是如此，因此读到邵燕祥书中的引述，引发了无限的感慨。现在，无妨再引述如下——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为没有人要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邵燕祥说，“我们接受了这个壮烈的启示”，也同时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侮辱，嘲笑，孤独，饥饿，监狱，死亡，无名的牺牲，以至“白白地浪费了青春”。邵燕祥接着指出，尽管屠格涅夫对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作了如此严酷的想象与描述，但仍然没有料到，还会有来自“自己人”，特别是自己千辛万苦找到的革命的引路人的“以革命的名义”的迫害”，这恰恰正是我们这样的中国的革命者、追随者的遭遇的特殊残酷性和荒谬性。[42]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首先应该检讨的，是这样的“为革命而忍受一切苦难”的“壮烈”情怀的负面作用。邵燕祥在回忆中，谈到自己被革命队伍逐出，成为革命的敌人时，就是这样“说服”自己，并获得一些心灵的宁静的：“投身共产党参加革命，这是我所作的一经决定永不改易的选择。即使这是长满荆棘的道路，我也要坚持走下去。让我的心在酸水里，在碱水里，在石灰水里煎熬吧，那时候它将无比的纯洁和透明”。[43]这里所说的在水里煎熬是从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苦难

的历程》里转述过来的（其原文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和屠格涅夫的《门槛》一样，都是我们的精神指引。我在研究 1957 年的右派精神历程时，就注意到了这样的影响，并有如下分析：“这样的心理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但这正是那一代革命者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共同的精神特征：将劳动与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知识者天然有罪的民粹主义的信念；将苦难神圣化，在苦难中纯净灵魂，成为‘新人’的‘圣徒’情结。这里显然存在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信念与情结的道德自律的纯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鲁迅早就警告过，‘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是有可能导致‘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忍从’的。现在，在这些右派身上发生的，正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却导致对专制的迫害的忍从的悲剧。”[44]邵燕祥也曾经谈到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前面已有讨论的“完美主义”一起构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45]这或许是这革命的一代精神魅力所在，特别是当下道德沉沦，一切得过且过，虚无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就显得特别可贵。但却是万万不可随意美化的，因为这正是当年我们这一代发生精神迷误，屈从于政治迫害的内在原因。

这里确实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邵燕祥，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同类知识分子，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之所以半是被动，半是自愿地接受了党对我们的死亡判决（邵燕祥被判为右派，我被判为中右），这样的结局其实早在我们追求革命的开初，就已经埋下了伏线。正如邵燕祥在其总结里所说，在我们身上发生

的是“一次又一次本想进入这一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甚至弄不清自己究竟想进入哪一个房间，已经进入的究竟是哪一个房间”的悲剧。[46]我们因追求民主、自由，摆脱奴役与压迫，而迈进革命的门槛；但革命却把我们逐出门外，成了革命所制造的新的奴役关系中的被奴役者。真正的悲剧还发生在我们事实上成为奴隶以后，还竭力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这样的“奴在心中”，更可悲的。而我们最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则是当我们把革命浪漫主义化，英雄主义化(或许革命本身就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完美主义化，道德主义化；当我们把革命的彼岸目标(如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现象)此岸化，追求“纯粹”与“彻底”，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当我们把革命的动力(被奴役、被压迫的人民)，革命的领导、组织者(革命政党与领袖)神化、宗教化；当我们把革命的伦理(集体主义，组织纪律性)绝对化，唯一化，把个性、独立、自由、人的尊严都视为革命的对立物；当我们把革命看作是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非革命即反革命，消灭异己的暴力运动，那么，我们就是在自掘坟墓。这就是邵燕祥在反思里所说，“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们驱赶到地狱里”。[47]这也是顾准所说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48]我对曾经支配我们的革命思维及其内在逻辑，有过这样的反省：“每一个命题在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上，都充满了纯粹、崇高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而其逻辑的展开，历史的实现的结果，却显示出了专制主义的血腥味。而且，终点的专制主义并非是对

起点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反叛,而恰恰是其逻辑的与历史的展开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后果,正孕育于起点的理想主义之中。这样,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互为表里,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特别是五〇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社会与历史的基本特征。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气质,使得他们身处这样的历史情境,常常不能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49]

这一代人能够接受这样的集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于一身的革命思维,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们成长的社会、时代背景,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文化影响,都有深刻的联系。邵燕祥在他的总结里,就谈到了“红色三十年代’以来普遍左倾的大气候”,他自己“在(四十年代)学生运动有限的实践中获取的狭隘经验”,“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包括苏联文学的影响——钱注),“19世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等的精神影响”,以及“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积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50]这些现实、思想、文化因素在我们前文的分析里,其实都是依稀可见的。但这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作专门的讨论。我们研究不够,只能说到这里。而且,我们已经拉扯得太远,还是要回到1958年以后的历史现场——(未完,待续)

註

[1]邵燕祥:《失去譬喻的人们》(1947年作),收《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44页。

[2]邵燕祥:《介绍<我是希特勒的女侍>,兼谈报告文学》(1946年作),《找

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 39 页。

[3]邵燕祥：《病》（1947 年春作），《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 46 页，第 47 页，第 48 页。

[4]邵燕祥：《蝗虫》（1948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 94 页。

[5]邵燕祥：《1948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第 79 页。

[6]邵燕祥：《蜕》（1948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93 页。

[7]邵燕祥：《普希金和他的剑》（1949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20 页。

[8]邵燕祥：《我底歌，我底心》（1951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44 页。

[9]邵燕祥：《警告美帝新闻记者》（1949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15 页。

[10]邵燕祥：《1949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12 页。

[11]邵燕祥：《歌唱，红色的歌手们——为纪念七一七而作》（1949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21 页，122 页。



- [12]邵燕祥：《1950—1952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30 页。
- [13]邵燕祥：《诗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读诗散记》（1950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31 页，第 134 页。
- [14]邵燕祥：《在人民大学诗社、北京大学文艺社诗歌组讲话提纲》（1955 年、1956 年），《沉船》第 64 页，第 65 页，第 66 页。
- [15]邵燕祥：《人怎样变成垃圾》，《沉船》，第 190 页。
- [16]邵燕祥：《1946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6 页。
- [17]邵燕祥：《遥远的敬礼》，《岁月与酒》（1947 年作），《火的瀑布》（1948 年作），《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78 页，第 91 页。
- [18]邵燕祥：《1949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12 页。
- [19]邵燕祥：《1949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12 页。
- [20]邵燕祥：《人怎样变成垃圾》，《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43 页，第 144 页。
- [21]邵燕祥：《1948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78 页。

- [22]邵燕祥：《1950—1951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28—129 页，第 130 页。
- [23]邵燕祥：《（在）斯大林逝世后给党支部的信》（1953 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52 页，第 153 页，第 154 页。
- [24]邵燕祥：《（在）斯大林逝世后给党支部的信》（1953 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52 页，第 154 页，第 156 页。
- [25]邵燕祥：《心中的话》（1953 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54——1976》，第 156 页。
- [26]邵燕祥：《心中的话》（1953 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57 页。
- [27]邵燕祥：《1952—1953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49 页。
- [28]邵燕祥：《（在）斯大林逝世后给党支部的信》（1953 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55——156 页。
- [29]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第 200 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年出版。
- [30]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第 314—315 页。
- [31]邵燕祥：《1954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54—1976》，第 160 页。

- [32]邵燕祥：《新的歌》（1956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67》，第177页。
- [33]邵燕祥：《1957年，好！》（1957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192页。
- [34]邵燕祥：《地球对着火星说》（1956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67》，第183页。
- [35]邵燕祥：《心中的话》（1956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185页。
- [36]邵燕祥：《心中的话》（1956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184页。
- [37]邵燕祥：《新的歌》（1956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177页。
- [38]邵燕祥：《耳朵，你的头脑在哪里？》（1955年），《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176页。
- [39]邵燕祥：《人怎样变成垃圾》，《沉船》，第121页。
- [40]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50—51页。
- [41]邵燕祥：《〈沉船〉校后记》，《沉船》，第195页。
- [42]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4——5页。

[43]邵燕祥：《我死在一九五八》，《沉船》，第 32 页。

[44]钱理群：《地狱里的歌声——读和风鸣<经历>，兼论反#右运动以后建立的社会秩序》，《拒绝遗忘：“1957 年学” 研究笔记》，第 253 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45]邵燕祥：《1954 年（概述）》，《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161 页。

[46]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7——8 页。

[47]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8 页。

[48]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 177 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出版。

[49]钱理群：《对于理想主义的反思》，《我的回顾与反思——在北大最后一门课》，台湾行人出版社，2008 年出版。

[50]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第 43 页。